

上山下乡，让千百万青年瞬间完成了从学生到农民的角色转换。谁知汪涛从知青到医生的事业的选择最初竟出自于茶场水塘边那个刻骨铭心的无奈……

## 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

汪涛

(2008年冬于美国弗吉尼亚)

到1975年，上山下乡已经是大部份青年人就业，参军或上大学前的必经之路。按当时政策规定，8月31日是知青下乡年限的计时时间。下乡满两年才考虑招工或推荐上大学。由于家庭原因，我在姑妈单位的职工子弟中学读完了初中和高中。1975年8月高中毕业后，我也就随该单位的子弟一起下到四川省乐山地区夹江县顺河公社同心大队青年茶场的知青点。这是一个典型的丘陵地区。相比我的大哥（1968初中还没毕业就插队落户到四川省绵阳地区青川县大山沟里的成都知青），我的乡下生活条件真的不知好了多少倍。但是我们到下乡时，已经没有我大哥那时青年人的争先恐后的自愿行动和无比激动的心情。

知青点最初有19个初中高中毕业的知青，到后来前前后后大约有30多个知青。大家以前大多来自于同一个学校，基本上互相都认识。初到茶场，我们男女知青分别住在两个临时的工棚里。茶场还有从各个生产队来的大约15个农村青年和回乡知青。我们的劳动内容除了管理茶山，开荒种茶树，种菜喂猪外，头半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基本建设。我们亲手填平了山头并盖了一排共12间的住房和一间大的厨房。一年后，修成了知青点自己的盘山公路。让拖拉机能直接开到知青点的操场。大约下乡八个月时，我们搬进了新房。男生住一边女住一边，中间作为库房的三八线将男女生宿舍分隔开。新房是用砖瓦和木头作支架建成的。房间的内墙是用竹片和泥土做的，房间里的外墙是没有任何修饰的砖面。每间房间的大梁部分都是相通的。从房间内往上看，木头梁和棕黑色鱼鳞状小瓦片尽收眼底。房间里的地面与外面操场一样，晴天“扬灰”地，雨天“水泥”地。这种房子在当地当时算的上是上等的房屋。漏风和不隔音已经不算是缺点了。最大问题是房间之间相通的上部部分给老鼠和蛇提供了方便的通路。老鼠进入每一间房间可比人要容易得多。每天一到深夜，房间的上方传来老鼠们的嬉闹声和蛇追老鼠发出的尖叫声，非常热闹。库房里存放着知青点的粮食。我住的房间紧挨着库房，每天晚上的闹声最大。天长日久这种声音对于我来说，已经从可怕的噪声到悠扬的催眠曲。偶尔一晚上我换到另一间女生寝室，“催眠曲”声音变了还会睡不好。老鼠经常下来光顾我们的领域寻找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好像都已经不怕老鼠了，只是很讨厌它。因为老鼠会咬坏我们的蚊帐被褥，经常还留下一滩难闻的鼠尿。蛇一般不会主动下到我们的房间，也不会破坏我们的东西。但是，一不小心它从房梁上滑下来，我们会非常害怕的。

第一年单位派了一位王姓带队干部。在最初的365天里，王队长他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度过了我们知青点最艰难的岁月。我们知青点的生活用水都是从走路大

约 20 分钟以外的山脚下的一个小池塘里一盆盆端或一桶桶挑上来的。在蔬菜还没成熟的菜荒时节，王队长带着大家找野菜摘红薯叶。遇到下雨下雪停工时，王队长带领大家政治学习，排练文艺节目，然后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现在想想，王队长一个快 50 岁的研究所高级知识分子，研究室主任，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同我们这些十六、七岁刚离开家门的年轻人一样，接受“再教育”，管我们的生活，管我们的学习，管我们的思想，真的非常不容易。

说实话，我们知青点第一年，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心情并没有太抑郁。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带队干部外，乡下生活的新鲜和尚未开始对前途的担忧也是我们有一段愉快时光的原因。虽然吃得很差，但由于一半的主粮是红薯的原因，每个知青还是被‘催肥’了。每天天黑前，我们女知青喜欢结伴端着脸盆排着队到山下洗漱，然后每个人端着一盆清水，沿着山间小路回到山头。晚上，男知青们喜欢围着王队长听故事。我们女生爱放开歌喉，站在知青点高高的山上，对着宁静的夜空高声歌唱，聆听自己歌声的回声。业余时间，我喜欢练钢笔字，每天晚上煤油灯下，抄着人民日报梁效的长篇大作。一面小镜子放在煤油灯的对面能增加亮度，减少耗油，是我们发明的节能方法。女青年们喜欢相互切磋绣花勾花编花技术。农村女青年喜欢给自己的心上郎君纳鞋垫。我纳的鞋垫只好给自己了。在我们知青点好像没有男男女女事。大家都很简单。男女生之间来往很一般，干活也不在一起。大家轮流当大厨，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每周换一次。男生挑水砍柴烧火，女生做饭洗菜，晚饭后将所有知青的暖水瓶灌好。虽是男耕女织，却也没有产生情愫。开饭时，男大厨敲一只破的脸盆并大声吆喝着“开饭了！”。紧接着一阵慌忙的脚步声涌向厨房。这个特殊的敲盆声音真是我们知青生活中的一个亮点。尽管每天都能听到三次，但我们还是嫌太少了。时时刻刻都在盼着它。我们晚饭大约在六点半吃。天冷时，九点钟睡觉之前，我和寝室里的另两个女知青总是喜欢各自喝一碗自做的辣酱汤。半勺从家里带来的辣椒酱用开水冲成汤，我们真的觉得很香很香。喝了后感到周身发热，入睡也容易。

下乡两年四个月中，我记得我只吃过两次肉。第一次吃肉对我来说，印象太深了。那是在我下乡一年零两个月时，一头茶场喂的半大的猪生病死了。当时农村生猪政策规定非常严格。绝对不许私自宰杀自己喂养的猪。农民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必须无偿地交给国家一半。茶场的这头死猪当然不在政策之内，所以可以任意处理。那天收工后，大队的几个头面人物都来了。死猪给农村人带来了欢乐。这一点我刚开始觉得不可思议。知青点的知青没有人对死猪感兴趣的，猪死了反倒很伤心。知青点厨房在我们晚饭之后，一下子来了许多人。大约八点左右一股诱人的香味从厨房飘了出来。我的一个室友再也忍不住了。她说：“厨房里的吵闹声太大了，我去看看”。两分钟不到，她冲了回来拿上自己的碗。她说，“我尝了一块，味道好极了！我要去盛一碗”。我和另一位室友相互看了看还是对吃这个生病小猪的肉有些害怕。她接着说，“大家都在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一会儿，她端着满满一碗“红烧肉”回来了。我们留在寝室里的两个人，终于忍不住了。尝了一块。由于是小猪，肉很嫩，没有肥肉，猪皮下面就是瘦肉，太好吃了！猪死了没法放血。所以肉是深红色的。在昏暗的灯下，无论从颜色到味道完全就是

红烧肉。我们两人拿起碗就冲到厨房……然而太晚了，肉全部吃完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我闭上眼睛还能回忆起那鲜美的味道。这种美味在今天已经再也感受不到了。

1976年初，我参加了县城卫生局举办的为期三个半月的农村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班由县医院主要科室的医生讲解农村常见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学期结束后，每个学员在县卫生局领了20元钱的药品。我当时买了一套大小都有的针灸银针，一副听诊器，一盒蛇咬伤口服药，一些外伤药和感冒药。我回到知青点时，当时正在上映《红雨》，《春苗》农村赤脚医生主题的电影。大家开玩笑对我说，“红雨和春苗只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成了赤脚医生。你却花了100天的时间。你的医术一定比他们好”。从此后我的知青生活中，除了每天同大家一起劳动外，还负责知青点内和茶场茶农的外伤包扎，蚊虫咬伤，感冒预防。银针在我的赤脚医生生涯中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时，我经常随身带上一盒银针和一瓶酒精棉球，走到哪扎到哪。比起知青来，村民更喜欢银针并相信其效果。这种免费医疗，而常常有立杆见影效果的针灸，深受大家的欢迎。有时，我还到卫生院要一些中草药，给大家熬感冒预防大锅汤。在那个没有油水的年代，没有人乐意喝它的。我开了一块地，种上了中药。我还学会了自制蚊虫叮咬剂。开荒时，经常能见到很大的蜈蚣虫。在一瓶75%酒精里放几条活的蜈蚣虫。两个星期后蜈蚣虫如同标本一样死在酒精里。这瓶酒精就成了很好的抗蚊虫叮咬剂。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效果灵极了。

1976年初秋的一天。这是我终身难以忘记的一天。火热的太阳正当午。知青点所有人都在午休。院子里静悄悄的。突然，一位男知青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知青点一位性格内向的男知青冯万平午休时，独自下山去洗衣服时癫痫病发作，溺水于一个不到一米深的水塘里。听到这消息，我立刻吩咐这位知青火速向公社卫生院求助（没有电话，他硬是跑了两里的山路），我一把抓上听诊器飞快地跑下了山。当我赶到现场，这位知青已经被拉出了水塘，毫无知觉地平躺在地上，嘴和鼻子满是泡沫。没有人知道他溺水有多久。我用手摸了一下他手上的脉搏，感到似乎仍有搏动。然后急忙跪在他身边给他做人工胸部按压术。这时知青点所有知青都来了。大家围站在一旁。个别女知青害怕地站得远远的。大约三十分钟后仍不见醒来。一位男知青见我满头大汗，自告奋勇地来替换我。又忙了二十多分钟，公社医生赶来了。他用听诊器往心前区一听，然后看了一下瞳孔，摇摇头，不容置疑地说，他死了。围成圆圈的知青们赫然地往外退了一步，恐惧顿时袭上了每个人的心头。昨天他还有说有笑地在我们中间，今天却冰冷地躺在地上。一条活鲜鲜的生命，一位与我们一样有着花一般的年龄的青年，昔日并肩战斗在田野里的伙伴就这样突然地离开了我们。生和死就一步。我真的为他感到可惜。没有发病时他完全是个正常人。下乡一年多，这可是他唯一的一次犯病啊！据说他本来可以不用下乡的。但是，直接留城按病残处理，工种很差。为了今后能有一份好一点的工作，他坚决要求接受“再教育”。可是，他为什么不约个伴，而是独自到水塘边呢？当天晚上，女生们都不愿碰我，说我摸过死人的。我的两个室友一定要我彻底清洗双手，否则她俩当晚不愿与我住在一个屋里。说实话，我对死者已经不害怕了。满脑

子一直在自责，我为自己没有能挽救住他的生命而难过。当时我感觉到他的脉搏莫非是因为我紧张害怕，微微颤抖的手造成的误感？我一直再假设，如果时光能重演，我能救活他吗？我非常希望我能！多少年来，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像一副沉重十字架压在我的心里。后来在他的父母要求下，冯万平的遗体没有火化，而是放在棺材里埋在茶场的山上。记得下葬那天，我们知青们怀着沉重的心情给他开了个追悼会。追悼会上，我一眼认出了冯万平的妈妈，一位善良的北方老妈妈。她看上去非常疲惫，约显苍老。她拉着我的双手，含着眼泪对我说，“谢谢你抢救我的儿子！我替冯万平谢谢你！”追悼会后本来还是晴天，突然阴了下来，天还下起了小雨。六个农村青年抬着沉重的棺材非常艰难地翻过山。真是老天有眼，为他而哭泣啊！下葬后，冯妈妈红着一双眼睛收拾着儿子的遗物。当她发现有一瓶她儿子没吃完的豆腐乳时，她一定要把它留给一位她儿子的室友。老妈妈真诚的心情，这位室友不得不当面接下了。晚上老妈妈走后，冯万平的室友端着这瓶沉甸甸的豆腐乳到处问谁愿意要。好像最后还是一名村民接了过去。

1977年春天来了，知青点大部分知青下乡快两年了。再过几个月我们就有资格回城工作了。推荐上大学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整个公社这两年根本就没听说有谁上大学的。这一年，冬天显得特别长，好像根本就没有春天。每天都是阴冷冷的。小雨一直下个不停。知青点的歌声和欢笑声越来越少了。招工的消息一点都没有。这时征兵开始了，下乡一年半的男知青可以报名参军。知青点有许多男知青都报名了，很快有五个男知青被批准了。在这五位光荣入伍的知青离开农村前，知青点为他们在操场上开了一个欢送会。那天又是一个阴天，五位入伍知青身穿没有领章帽徽的，崭新的棉冬装，带着茫然的神情，排成一排，恭恭敬敬地坐在自己的小凳子上。女生们将原有自编的节目向他们又表演了一遍。寒风轻轻地吹着。我们脸上已经挤不出灿烂的笑容，心里也掀不起丝毫的激动。有的只是，内心痛苦的呐喊，“我的明天会在哪里？”

自从知青点五位知青离开后，旷工的，请事假病假回家的知青也多了起来。知青点里经常出奇地安静。有时连谈话的声音都听不到。我因家远只能坚守在知青点里。经常独自守在一个无声无息的山头上。黑夜和孤独对我来说，比起对前途的困惑迷茫更容易克服。我害怕想，我的明天是什么？1977年八月，第一批招工的名单下来了。我们知青点除了我以外，所有下乡满两年的知青都在名单上。我已被划入另册，没有一个可以等待的期限。看到我的两个室友喜悦的样子和在我面前表现出的极度克制而尴尬的神态，我终于坚持不住了。请了两个星期的事假，我回到了成都。这大概是从我下乡以来的第一次长假。在家里的这两周，我同样是度日如年，唯一好的是身边没有额外的刺激。我冷静下来仔细想了又想，我必须回去。呆在家里更没有前途。以后任何渠道跳出农村都必须要有好的推荐。何况我一直表现的非常好。没呆到两周的时间，我从新整理了自己的情绪踏上了回知青点的路。

很奇怪，自从休整回来，我好像变了一个人。对身边的人和事也不太在意了。常常自己安慰自己，我与旁人不一样，我有我自己的命运，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1977年十一月初的一天，一位在茶场劳动的农村青年气喘嘘嘘地跑上山来交给我

一封我家里来的加急电报，“母病速回”。当天晚上我就火速地赶回了家。回到家才知道这是家里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为了我能参加年底的高考，以“母病”为由争取我回家复习。这消息对我来说真是黑暗里的一道曙光。

经过三个星期的复习，我又回到了农村。后经过报名，填志愿，考试，体检，后又经过了一段焦急的等待，最后在1978年春节后拿到录取通知书。由于当年四川省高考填志愿在考试之前，而且没有人知道考的程度和录取的分数线。我填志愿时完全是凭着当时自己的感觉，到县招办要了表，填了就走。有两点我是非常清楚的，一是我无论如何必须尽快离开农村，二是坚定地认为我要学医。现在想想，这可能是冲着我心里的那个抹不去的十字架的。填写志愿表中有一行，是否愿意服从分配。我毫不犹豫地写到，“凡是医学院我都服从”。1978年春天，我真的如愿以偿地成了高考改革后第一批，七七级，医学院的本科生。

过了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知青点所有的知青都参加了考试，包括那十几个将当工人还没有离开农村去单位报到的知青。七七级我们知青点只有两个考上了大学。一个是下乡不到两年的男生，另一个就是我。从那以后，我与他们走上了不同的路。医学院毕业后，我留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八年的临床医生。后来到美国念书，再后来移民定居美国。我经常在想，如果当时没有招工机会，说不定他们中间也能有考上大学的，以后的命运会完全不一样。实际上人的可塑性是很大的，挫折和坏运可能是好事。它能激发你上进。人生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正因为我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锻炼，刚到美国时，“洋插队”艰难无望的留学生活也很快就挺过来了。回首往事，我不会后悔我在乡下的蹉跎岁月。但也不赞成“上山下乡”的运动。因为它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在那个年代里，像我这样遇上并能抓上好机会的人实在不多。真心地感谢老天对我的厚爱。隔着千山万水我也时时刻刻地在牵挂着那些，曾经与我一样的，我亲爱知青朋友们。由衷地希望他们健康，幸福，快乐。

## 后记

留下我青春足迹的知青岁月虽已是翻过去的一页，但每每回味起来仍让人唏嘘不已。缅怀过去，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思考和反思。

我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和短暂的赤脚医生生涯中，我真的能痛彻的体会到农民看病难。那就是缺医少药没有钱。而赤脚医生这一制度能在很大程度缓解这一问题。赤脚医生能及时地，花很少钱，就能解决农民的小病小伤，以及预防疾病问题，从而避免了相当部分的小病向大病发展，甚至危及生命。另外，赤脚医生因为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培养一个赤脚医生也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欣闻中国已在农村建立了类似于赤脚医生制度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希望这一制度给广大农村群众带来更好的医疗健康保障。

在我抢救溺水知青时，尽管当时我已尽了自己的全部能力，但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和朝夕相处的伙伴在我手下离我们而去，那种感觉还是非常痛彻心肺的。特别

是我在医学院学到了更多相应的知识后，就更加的内疚。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一定能做的更好，更专业。也由此更加理解了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

吸取教训是我们对过去的最好回报。在这里我想给朋友们推荐一种简单的心肺复苏术（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每个人都能在几分钟内学会。这短短几分钟的学习内容，可能就会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你身边的人派上用场。有统计表明，心脏骤停后能在 2-3 分钟实施及时的 CPR，并在 10 分钟内专业人员赶到，存活的机率会大幅度提高。这时，时间就是生命。而最能及时进行初步 CPR 的，就是在患者身边的你。

在北美，许多公司和部门都免费提供 CPR 的培训。有机会的朋友都应该去培训一下。培训结束后，还会发给你一张 CPR 证书。有效期一年。这个证书能确保你在为别人做 CPR 时的合法。

另外，我还有个想法。在下一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能否作为一个提案提出。要求全国所有有条件的单位（机关，学校，公司，厂矿，部队等）都进行 CPR 的普及和培训。这样一定会大幅度降低因各自原因引起的心脏骤停，抢救不及时而至的死亡率。

下面是有关 CPR 连接，

<http://depts.washington.edu/learncpr/quickcpr.html>（英文）

<http://depts.washington.edu/learncpr/chinese/quickcpr.html>（中文）

<http://depts.washington.edu/learncpr/chinese/videodemo/adult-cpr-video.html>（视频）

以下照片拍摄的地点：四川省乐山地区夹江县顺河公社同心大队青年茶场，知青点

照片一，政治学习。

时间：1975年10月

地点：工棚 ---- 女知青宿舍

左到右：刘金琴，包建英，高春莲，作者



照片二，劳动休息学习

时间：1975年12月

地点：未来的操场和宿舍所在地

左到右：包建英，刘金琴，张建妹，高春莲，郑爱丽，薛小凤，张海英，作者



照片三，女知青在茶山除草

时间：1975年12月

地点：茶山

左到右：后排，包建英，刘金琴，高春莲，薛小凤

前排，张海英，作者， 张建妹，郑爱丽



照片四，全体女知青

时间：1977年3月

地点：知青点山头

左到右：后排，黄兆君，薛小凤，包建英，作者，刘金琴  
前排，郑爱丽，张海英，张建妹，高春莲



照片四，全体女知青和来带新兵的武装部部长

时间：1977年3月

地点：茶场山头，照片的背景是一片田野。

左到右：

黄兆君，高春莲，郑爱丽，张海英，部长，刘金琴，作者，薛小凤，包建英，张建妹



照片四，全体知青欢送入伍知青

时间：1977年3月

地点：知青点操场，背后是一排我们的宿舍。

左到右：

后排，王建平，梁光杰，陈毅，曹春豪，杨州，张卫刚，赵晓明，陶志勇，张海生，文进

中排，张建妹，张海英，高春莲，黄兆君，包建英，薛小凤，作者，刘金勤，郑爱丽

前排，孟庆一，杨和平，郭长青，朱颜，谭建华

